

徐俊西

著

本书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徐俊西的文艺理论批评选集，收录了作者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十篇文章。作者多年来笔耕不辍，历经了大半个世纪的是非风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文坛独树一帜。文集分为「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散文」三个部分，内容包括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论、探究争鸣与观摩鉴赏等，其中尤其是对重大题材和题材多样化问题的论述，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探讨，对文艺真实性的辨析，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思考，对王蒙、赵树理等知名作家全方位的评介，对「高雅文艺」的定义等，均体现了作者过人的胆识与学养，在当时国内的文艺界也曾引发过较大的争论。

作者的文笔犀利，论述精当，逻辑严密，思路不落俗套，评析客观中肯，又紧跟学术思潮的演变，展示了一位成熟批评家的风范。本文集不仅让读者得以一窥作者在文学森林中探索、跋涉的足迹，还能使读者从中了解近40年中国文艺批评重心的变迁，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文坛

WEN TAN YI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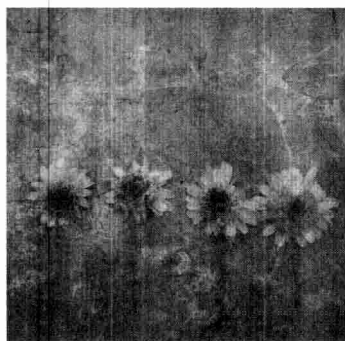
忆事



文坛忆事

徐俊西 著

W E N T A N Y I S H I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忆事 / 徐俊西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309-07328-7

I. 文… II. 徐… III. ①文艺理论—文集②文艺
批评—文集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0-53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1783 号

文坛忆事

徐俊西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 军 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2 字数 483 千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328-7/I·554

定价: 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

在我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的生涯中,最引起纷争的一件事莫过于“批评恩格斯”了。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的文艺界正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的热潮中,意气风发地迎接着一场即将到来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我便凭着一种理论的激情批评起恩格斯来了——即在 1980 年第 1 期的《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的文章,对长期以来一直被我国文艺界奉为圭臬的恩格斯的“典型理论”提出疑义,这下便引来了轩然大波。

简单地说,我的疑义就在于恩格斯的以下这段话:

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 1800 年或 1810 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 1887 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

这就是说,《城市姑娘》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在 19 世纪 80 年代还把工人阶级作为“消极群众的形象”来描写,因而就不可能是“充分典型”和“正确的”。

对此,我认为恩格斯的这种批评是欠准确和公正的。因为:

第一,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是 19 世纪 80 年代的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消极群众的形象”,即使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今天,工人阶级中也仍然存在着“消极群众的形象”。作为现实生活真实反映的文艺作品,描写这些“消极群众的形象”为什么就不可能是典型的和正确的呢?

第二,耐丽作为恩格斯所曾经说过的“这一个”的独特的典型人物,她应该成为“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但却并不一定非要成为 19 世纪 80 年代工人阶级积极的、倾向革命的代表。因此,把耐丽描写成“消极群众的形象”,也并不等于就是把当时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描写成了“消极的群众”。

所以长期以来,“一个时代只有一种典型环境,一个阶级只有一种典型人物”的创作公式,便极大地束缚了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因此我认为要破除这种公式,就必然要对恩格斯的这封信的观点提出讨论和质疑——这正像后来《文艺报》的资深编辑陈丹晨在谈到那些坚持这套公式的人时所说的那样,他们“几乎无例外地援引了恩格斯给玛·哈克纳斯的信中的一段论述来证明这种公式的正确和无可置疑。有的文章还直截了当地说,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他们衡量这些作品的‘尺子’”。

其实,《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的这封私人信件是 1932 年从恩格斯的遗稿中发现的一份不完全的草稿,其中有些观点和论述并不具有科学定义的性质,是完全可以研究和讨论的。可是我们有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们却不是这样,他们一见到有人竟敢向恩格斯提出异议,便不胜惶恐地惊呼:“有这种思想的人真是可笑不自量到了极点!”以至彻夜难眠,除了写文章批评外,还直接写信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揭发,害得《上海文学》的责任编辑周介人大为紧张。其实,作为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必这样卑躬屈膝的。记得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当时正确,现在仍然正确;一种是当时正确,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现在就不正确或不那么正确了;一种是当时就不正确,现在也仍然不正确。

但说也凑巧，上面提到过的那位卫道者的举措虽然当时没有奏效，但却起到了“歪打正着”的作用，使我后来终于失去了很多再与他们争辩的机会——事情是这样的：后来当我竟会被调到他曾经告过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时，为了“坦白从宽”，在部里的见面会上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大家交代：“我是批评过恩格斯的。”接着，当时的市委书记找我们新来的三个人谈话时，就指着我和刘吉说：“你们两人都是会写文章的，现在到这里工作以后就不要写了吧……”为了遵守这种“职业道德”，我以后真的就很少写作了——特别是对比较敏感和有争议的问题。对此有很多熟悉和关心我的朋友和长者常常对我说，你还是应该多写点东西啊，时间长了业务就会跟不上的。特别是王元化先生——我一直以为我到宣传部工作与他有关，因为他在宣传部当部长的时候就曾要调我去做文艺处处长——曾经现身说法地对我说：“你还是要坚持写点自己要写的东西，不然以后就拿不起来了。你知道过去我在部里干了两年，后来花了三年的工夫才又逐渐恢复过来。”我想，您尚且如此，我就更没有辙了。

二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又一次为我惹出麻烦和颇出意料的事，仍是有意无意地捅了文化“正统派”的马蜂窝。

这是1987年初的事。有一天我们文学所的一位同事来对我说，你还记得两年前那篇曾经轰动一时的、充满肃杀之气的文章《新春的反思》吗？我说当然记得，我还曾经准备写文章“争鸣”呢。他说你现在更应该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艺事业出现的繁荣兴旺和生动活泼的新局面，最好地证明了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是非常错误和十分有害的。

我想，鲁迅先生曾说过：“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我何不就此写篇文章来对“文革”以来为害甚烈的所谓“破坏性思维方式”做点剖析，让大家知道只有把过去曾经喧嚣一时的一切都要“破字当头”改变为“立字当头”，才能从总体上形成有利于文艺生长的社会生态环境。

为此，我把这种思想方法和政治心态概括为以下种种：

一曰“你死我活的思维定式”。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上纲上线，非把明明可以自由竞争、共同探讨的学术理论问题弄到大家动弹不得、听候发落

的份上不可。比如关于近年来文艺领域中出现的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和观念更新、现代意识等等不同意见和不同流派的探索争鸣,原本是一种正常的艺术实践和学术讨论,经过平等的竞争和实践的检验,是可以日见分晓的。可是《反思》的作者们却非要推断出“文艺界的确有一股错误思潮在滋长、蔓延”,“阶级斗争还要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着”。

二曰“不证自明的思维结构”。为适应这种强加于人的斗争哲学的需要,这种思维定式往往无力也无需进行深入细致、以理服人的定量分析和逻辑论证,而只需采取“不证自明”的引证方法——即一般所谓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注经式方法,便可无往而不胜。其结果便终于形成了十亿人民只允许一个脑袋在思考的荒谬的时代。

三曰“唯我独革的思维心态”。其具体的思想行为特征:一是“居高临下,以势压人”;二是“愤愤不平,怨天尤人”。总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然,这世界就越来越不成体统了。

就这样,顺藤摸瓜。文章写好后我就把它寄给了当时的《文艺报》编辑部。过了一段时间,我在该报的学生潘凯雄来电告诉我:稿子编辑部讨论了好几次,意见不一,可能不会发表了。我说那你就把稿子寄还给我吧。但后来也未见寄回。时过境迁,我也就把这件事忘了。一直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发生以后,正在事态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我的那篇已被封存很久的稿子却突然又被《文艺报》登载了出来。起初我想,在当前这种风起云涌的“大动乱”时期,谁还会来关心这陈年旧账的事,所以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谁知后来这件事却被京沪两地的某些人抓住不放,旧账新算,闹得沸沸扬扬……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知道上海有一个人称“木棍子”的人正在向报社投稿批判我,并通过各种关系要市委表态。我想此事不要使领导为难,就很快给顶头上司陈至立写了辞职报告,说明我不宜再在宣传部工作,要求仍回上海社科院搞我的业务。陈至立说报告先放在我这里,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后来有一次在看完电影后她对我说:“你还是很沉得住气的嘛……我已与国栋同志谈过你的事,他说没关系,这是过去的事嘛。”

后来有一次我到北京中宣部开会。一天晚上,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贺敬之找到他的房间去谈话。他说“《文艺报》送来批判你的稿子,我考虑到你还是我们文化部门的领导干部,被我搁下了。你今后要注意哩——我上次去上海听你汇报,条理还是清楚的嘛……”后来批判我的那篇稿子几经周

转,最后还是在《文艺报》上登出来了。

三

在我的文学理论批评的文章中,除了以上这两个“特例”外,大体还可以分为如下的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为作家们捧场和解围的。捧场自不必说,如遇到像赵树理、王蒙这样的大作家固然要捧;自己认为值得捧或需要捧的也捧。无须赘述。而所谓解围,就是当一些揭露矛盾或批评社会的作品引起纷争或招来麻烦的时候,例如像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的话剧首次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有舆论说它丑化国家干部,把党员写得比旧社会的官员还坏,以至有关部门的领导来找我提意见。于是我便写了一篇评论来为它辩解和开脱,说了一些诸如文艺创作是一种“虚的实体”,不能与生活作简单的对比呀;文艺是通过“干预灵魂”来“干预生活”的情感形式,必须要以情感人呀等等之类的话。所以我常说,我的许多评论文章不是写给同行和作家们看的,而是写给一般读者和管文艺的领导看的。记得有一次某报社的一位领导出题目要我写一篇“共产主义思想和文艺创作”的文章,我虽然感到一头雾水,但想到借此倒可以在党报上给干部们作一次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讲座,岂不一举两得。于是便应承了下来。后来有一次我到陈子展先生家去拜访,闲谈之余,他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对我说:“你的关于‘共产主义与文学’的文章写得面面俱到,也难为你了”。我不知他真的在夸我还是损我。记得他刚刚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第一次到他家去拜访时,一进门他就说“我是属狗的,会咬人。反右斗争把我打成右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就是说我骂过鲁迅。其实三十年代我与鲁迅咬来咬去,都是很平常的事”云云。

关于我的评论文章的这种“政治化”、“行政化”的倾向,还可以从以下这件事得到某些印证:有一次我曾以《关于艺术规律》为题,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着重对文艺的社会功能和行政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表述:

一是在具体作品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有时还存在着不必要的干涉和限制的现象。如只能写好人有好报的“大团圆”结局,不能写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只能写人物情感中道德层面的单一的感情形

式,不能写人物心灵深处的复杂的心理状态和生命意识;只能写“再现型”的生活真实和人物情状,不能写“表现型”的意象幻觉和抽象变形……如此等等,从长期的创作实践来看,都会不同程度地妨碍和限制个人艺术创造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其所以如此,除了权势形成的颐指气使的优势外,还因为存在着一种“常识”上的误区:即按照一般人的“常识”,往往总认为其他科学领域都是高深莫测的,不容他者置喙;唯独文艺创作,“不就是反映生活”嘛?谁都有自己的生活,因此谁都有一套应该这样反映、不应该那样反映的高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生活的富有不等于艺术创作的富有。从生活到艺术,其间所经历的艰辛和奥妙的创造过程,其“高深莫测”是绝不在其他科学领域之下的。所以即使从个人自重自爱的角度来说,在具体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少掺和,也实乃“藏拙之道”也。

一是不要把文艺创作当作一般的生产任务、工艺流程来抓,提指标、订规划、查进度……其实这一切往往都是形式主义和劳而无功的。因为文艺创作的成败得失有着许多非物质、非意志的决定因素,不像其他工程建设和生产作业,只要投下一定的人力物力,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就会取得预期的效果。为此对于艺术创造来说,事先制订好具体的任务计划,并与主管部门或和个人的实绩联系在一起是很被动的。弄得不好会落个“行政命令”和“不懂艺术规律”的坏名声。因此像现在有些文艺主管部门那样,把领导文艺工作理解为“抓创作”,把“抓创作”又理解为帮助作家、艺术家一起创作——定题材、出主题、列提纲、讨论初稿、修改定稿……如果这些领导确实是行家里手(这种可能性较少),而且意见又仅供参考,那倒也罢了——然而也不算是抓在点子上;如果当真只是一位并非从业人员的行政领导(这种可能性较大),而自我的“艺术感觉”又特好,那就不足为训,而且十分可虑了。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人告诉我,北京方面的主管部门有人曾查问,某人现在发表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而与此同时,在上海每年一度的创作研讨会上,有人却把我的文章复印出来散发给与会者们参考。

第二类是与同行们探讨和争鸣的。说得直白点就叫“打笔墨官司”。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则往往乐此不疲。记得有一次国内的一些主要文艺的报刊都登载了阳雨、刘心武、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的文章,在进行关于文艺的目的、功能和社会效应的辩论。我便兴奋不已,在积极参与论争的一篇文章中高呼:“我们早就盼望着有这么一天,对于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的问题能

由文艺界的同志自己心平气和或面红耳赤(最好不要上纲上线)、微言大义或高谈阔论、一本正经或嬉笑怒骂、一分为二或否定一切地来讨论解决或不解决,而不要总是‘平时一边倒,到时兜着跑’……”可见当时的我们与现在的文学新秀们相比,是何等的幼稚和可笑,令人汗颜。

但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争鸣中似乎有些事情也真的让自己感到高兴和颇为自得的呢。例如有一次在刘再复与陈涌关于“文艺的主体性和方法论”的讨论中,我对他们的观点表示了三分赞成陈涌,七分赞成刘再复。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后,主编谢永旺曾对中新社的记者说:“对刘再复、陈涌的争论,作家协会所属的《文艺报》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既不同意陈涌的观点,也不完全同意刘再复的观点。陈涌的文章虽然发表在权威的《红旗》杂志上,但他只是一家之言,是可以讨论、而且应该讨论的……”可见当时的《文艺报》能发表我的与《红旗》观点不同的文章是承担一定风险的。但是说来事也凑巧,就是在这不久之前,《红旗》也来向我约过稿,我给他们写了一篇名为《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思考》的文章,同样也是登在“‘权威’的《红旗》杂志上”的哩。

第三类则是自己感兴趣和稍有积淀的课题。这除了以前曾经研究和创作过的一些文艺理论批评和散文一类的文章以外,还有诸如文艺理论《范畴学》的演变和规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现和隐忧等等,现在看来是无法也无需再津津乐道了。对此在我进入 70 老龄的时候,曾写过一首小诗,现在也移在这里,聊以自嘲:

人生七十古来稀,
剩得余年忆旧时;
少小虽知求学好,
青春尤悔读书迟。
生逢盛世成“老九”,
误入官场惹是非;
幸得老来知进退,
亲情慰我度期颐。

目录

文艺理论

- 3 略论重大题材和题材多样化问题
- 7 “形象思维”辨析
- 12 为“题材无差别”论一辩
- 16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和实践
- 26 关于文艺的真实性、倾向性及其他
- 32 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
——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
- 38 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
——答程代熙同志
- 45 也谈“歌颂”与“暴露”
- 50 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 57 共产主义思想和文学创作
- 61 再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答陈涌同志
- 70 时代精神与审美评价
- 73 典型化理论再认识
——再答程代熙同志

- 81 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典型理论
- 86 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思考
- 95 也谈文艺的主体性和方法论
- 101 艺术的再现性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
- 105 关于文艺社会学批评的几个问题
- 111 略论新时期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发展
- 122 文学理论范畴概念科学性的探讨
- 132 新时期“文化小说”漫论
- 142 社会、人生与艺术审美
——也谈艺术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效应
- 147 再谈文艺功能的价值形态和价值取向
- 153 也谈现实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 160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162 无主题变奏
——对世纪末文学领域中“三个跨越”的审美评估
- 166 精神文明的艺术体现
- 171 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
——纪念《讲话》发表 50 周年
- 177 确立文化发展的新坐标
- 180 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
- 182 关于“中国化”的质疑

文艺批评

- 187 从《伤痕》讨论谈文艺的真实性问题
- 194 论“框子”
- 196 孙处长是“全权代表”吗?
——从《“炮兵司令”的儿子》谈对艺术典型评价的几个问题

202	如何评价文艺作品的真实性
	——从影片《巴山夜雨》的讨论说起
206	用奋发向上的精神看取人生
	——从影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讨论所想到的
209	略谈《出山》的艺术特色
211	探幽烛微,深入浅出
	——评介蒋孔阳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
214	跟上时代的步伐
216	新作漫评
	——评“《延河》小说专号”
222	论王蒙的小说创作
239	论赵树理的艺术风格和创作道路
262	走出狭弄以后
	——首届上海文学奖获奖小说述评
265	向艺术的深度与广度探求
	——简评长篇小说《夜与昼》(上卷)
268	一种思维方式的终结
	——重读《新春的反思》
273	一个仍然值得关注的问题
	——文艺目的性小议
275	关于文艺批评的两难互补
277	社会学批评的价值取向
279	从《围城》的改编谈电视剧的艺术品位
282	新时期电影漫议
285	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
289	成就和不足
291	关于文艺新学科的建设
293	庆典文艺和文艺的庆典
295	为才女班昭造型

297	股市情缘
	——《股票的缘分》的情感形式评析
301	探索文化市场
30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艺的审美导向
309	也谈“高雅文艺”
314	为《苍天在上》的合法性正名
316	一种情感形式的再现
	——读长篇小说《小女人》
318	《雷雨》改编得失谈
320	为了“记住”的纪念
	——读陆荣椿的《夏衍评传》
322	在“不该发生的故事”发生以后
324	时尚期刊访谈录
327	谈谈文学评奖
329	关于艺术规律
332	历史剧创作与现代审美
335	传统题材的现代阐释
	——我看新版神话京剧《宝莲灯》
338	凤凰涅槃新语
	——《“火凤凰”上海新批评丛书》序
340	大上海的性格与精神
	——序《大上海小说丛书》
342	广采博撷、知人论世
346	评论家笔下的他们
348	回顾与前瞻
355	批评者的守望
358	关于文艺批评缺位的反思
367	序瞿章杰的报告文学集
369	批评的品格

- 371 一份关于 90 年代文学的集体答卷
——百名评论家推荐 90 年代作家作品活动答记者问
- 375 《乌鸦》的挨骂及其他
- 380 小说类型化的时代到来了吗
- 384 提高批评的信誉
- 386 历史电视剧的走红及其艺术定位
——兼评《康熙王朝》的审美导向
- 391 话说“马扬语录”
- 394 英雄何必刺秦皇
- 398 文学的先进性与世界进步潮流
- 401 理想与情感的赞歌
- 403 我对上海文学现状的思考
——在“上海文学地图”座谈会上的发言
- 405 《抒情年代》及其他
——评奖作品浅说
- 408 走出“大背景”的误区
- 415 善待“青春文学”
- 418 亲情的言说及其他
——读俞氏父子的《留德家书》
- 421 心理定势和时代潮流
——读长篇小说《隔洋》
- 425 “市宫”剧作家群的过去与未来

散文

- 429 论“把关”
- 431 “节日”文谈
- 433 也谈职权影响力和非职权影响力的关系
- 437 往事情怀

439	真理占有我
	——悼念孔阳先生
442	纪念介人
	——并序《周介人文存》
445	且说“生态旅游”
447	世纪的门槛
449	岭南奇观
451	端砚的情结
453	再说生态旅游
455	氏族文化的奇异景观
	——兰溪诸葛村文化旅游观感
458	海洋文化的一个亮点
460	道教文化的精神提升
463	不让“谋财害命”的投机行为得逞
465	且说人类劳动的人性化进程
467	文艺行政职能的“越位”和“补位”
470	给“东方好莱坞”发迹的一个理由
472	润州处处皆名胜,最爱南山古竹林
474	“服务站”与“管教所”
476	愚者之虑
478	万灵造化自天成
	——重游善卷洞有感
480	“镜子”和“探照灯”
482	仁者巴金、智者巴金
485	长者风度
487	别了,潘兄
490	如何盘点人生
493	一点感悟和记忆
495	后记

文艺理论